

有形与无形：

文化寻踪

顾晓鸣
著

责任编辑•高忠
装帧设计•王建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有形与无形： 文化寻踪

顾晓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 忠
封面装帧 王建纲

有形与无形：文化寻踪

顾晓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94,000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00

ISBN7-208-00496-0/C·6

定价 5.10 元

目 录

〔1〕	引 言 大智无形和无形的文化 I
文化研究：悖论、方法论和多维视野	
〔9〕	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悖论” 1. 悖论之一：“纹花”对“文化” 2. 悖论之二：“纹花”的可通译性和不可通译性 3. 悖论之三：时间流中的“文化” 4. 悖论之四：传统文化的双重性 5. 悖论之五：处于时空变换之中的“文化”评价标准
〔22〕	二、文化研究中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1. 文化学、文化研究和对“文化”的研究 2. 文化概念和“文化”的词义学解释 3. 若干具体方法论问题
〔44〕	三、文化研究的多维视野 1. 对文化理论先驱者的概略巡视 2. 西方文化理论的基本格局 3.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若干文化理论环节

II

文化，在文化的缝隙之中

- 〔105〕 一、文化的“原型”和文化理论的“原型”
- 〔112〕 二、寻找中国文化中的“原型”：“象”
- 〔115〕 1. 《易》的核心是“象”，古代思想的基点之一是《易》，
2. 作为中国“理想型式”的“象”和“以象制器”
3. 从文化的几个重要方面来看“象”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 〔137〕 三、文化学视野中的“文”和“象”
1. “象征符号的动物”和两种“理想型式”
2. “Homo Pictor”和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新视角
3. “文”和“象”体现的中国文化通观
4. “象”这种“理想型式”在积极方面的特点
- 〔152〕 四、在犹太—基督文化中寻找“原型”：上帝及其意象
1. 犹太文化为世界文化提供了一个“文化脚本”
2. 犹太“纹花”（意象/象征符号）的内在结构
3. 犹太文化通过“纹花”对其文化艺术的影响
- 〔182〕 五、文化：人为的事物
1. 文化：以人的经验为中介
2. 经验：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
3. 文化和人类一般经验的外化
4. 意义、准世界和文化空间
- 〔215〕 六、从“生存空间”到“文化空间”：以犹太

	文化为个例的分析
[217]	1. 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是文化发生的物质基点
[225]	2. “中介性客民”的存在和活动形式如何外化为犹太文化的特征
[236]	3. 犹太文化的若干内在因素对世界文化的意義
	III
	货币·礼·权力·信息：文化及其“泛化媒介”
[244]	一、货币和文化：悖论与两难
[246]	1. 货币是人类最大的文化象征符号
[247]	2. “事理”不能完全取代“人理”
[250]	二、“货币与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特征分析
[251]	1. 中国生产形态的双重特点
[254]	2. “天人相应”的文化原则
[256]	3. 高度“符码化”的文化
[258]	4. 重教育的文化和“内化”
[259]	5. 性和生命活动的双重特点
[260]	6. “内旋”和“武化”的交替
[261]	7. 中国式的“理”和“礼”
[265]	三、“礼”的文化机制和利益关系
[270]	1. “礼”的文化实质和对“礼”的反叛
[277]	2. “礼”、利益关系和文化的变迁
[282]	四、文化的“权力学还原”
[284]	1. 文化评价背后的权力因素

-
- | | |
|-------|----------------------------------|
| 〔287〕 | 2. 处于权力关系中的文化人 |
| 〔290〕 | 3. 权力关系在文化品内部的表现 |
| 〔295〕 | 4. 文化品：“自身”和“象征符号” |
| 〔298〕 | 5. 利益和实践：文化的选择机制 |
| 〔306〕 | 五、生产力和信息：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 |
| 〔307〕 | 1. 文化：生产力、信息、心态和氛围、象征符号
和遗传机制 |
| 〔310〕 | 2. 现代社会发展对文化各方面的影响 |
| 〔313〕 | 3. 决定未来文化趋势的几个内在因素 |

引言：大智无形和无形的文化

当我似乎已抓住了“文化”的某一个关节处，正预备写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大般涅槃经·寿命品》上的一句话：“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暴雨、巧炎，亦如画水，随画随合。”文化亦如是。文化在时间流中，在人的活动和动作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呈现、淡漠、消失；每一瞬间，有明明白白的“文化”在，但转眼之间，已成过去；岂不正如水中画写，随画随合么？因此，抓住文化，谈何容易。文化现象，闪闪烁烁，起自人类之肇始，多少哲人学子都试图用种种不同的语汇和方式，留住它，把它描述出来，但不料他们的这些努力也在时间流之中，成为水上之画，绝大部分也是随画随合，随着时代的变迁消失了；剩下来的片言只语、残墙断垣，与其说本身就是文化，还不如说它们只是过去已逝的文化的踪迹——如果没有今人根据哲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乃至

语义学、图形学以及博物考古，对它们进行释义，它们并不体现应该体现的文化；相反，在眼下一瞬间的人的举止、衣服的式样、文章的语言……等等之中，依靠同样的释义方法，人们却可以看出倒溯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也就是说，在这一瞬间，世上的一切都存在着昔日文化之踪迹。

文化如水上之画，随画随合，留下的只是文化的踪迹。在“水上作画”的，是人的历史活动，留下的文化踪迹则遍布于人间一切的一切。天然的石块一经人搬动，摆成了巨石阵，这便留下了文化的踪迹；石块纹丝未变，文化在哪里？天上的太阳，可以说丝毫未受到人的影响，纯粹的自然之物，但由于人们的畏惧、诅咒和颂赞，它却成为一种“文化的太阳”，具有那么多特定的文化意义；文化在哪里？至于那些经人加工和创作过的东西，其上面的文化痕迹更是历历在目了；但仍有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在哪里？文化来自何方？我们说，在时间流中的人的活动，为它们带来了文化的意义，在它们上面留下了文化的踪迹。也正是今天人的历史活动，使这些踪迹重新“复原”，呈现出已逝去的文化。但是，时间之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今日的人们在今日的活动之中，有今日之需要。处于今日之情境，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复原昔日的文化？

带着这样的眼光，来检视一下我们通常认为的“文化品”，例如绘画音乐、语言文字、建筑园林，就会发觉，它们与其说就是文化，还不如说是文化的遗迹。同样需要有文化的释义，才能呈现身上所带有的昔日的文化，而这种

文化究竟如何模样，反过来又依赖于今日人们的历史活动、今日之情境和今日人们的科学眼光及方法。

这样，文化确是难以把握了。如果粗浅地把文化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的历史活动过程呈现的模样；另一部分是历史活动留下的文化遗迹，那么，由于上述的特点，文化必然具有一种特别的不确定性和特别的广泛性。

于是，对任何特定文化的研究，对任何文化现象的把握，以及对文化概念本身的探讨，都需要有一种特别的方法论：不能像对待物件那样对待文化，不能用定义简单地框定文化概念，要追寻，在追寻各种文化踪迹的过程中，追寻文化概念的踪迹。

所以，这本书的标题叫做：“有形和无形：文化寻踪”。

事实上，近代文化研究的兴起，就是从追寻文化的踪迹开始的：大规模的考古，是从器物上的文化遗迹着眼，来复原已逝去的年月中人们的活动样式；文化人类学，则通过对现在这一瞬间正活动着的原始民族活动样式的调查研究，比照作为文化遗迹的古书记载，来复原已逝去的年月中人们的活动样式。而这类复原工作所依靠的眼光恰恰又是今日活动的结果和出发点——一切文化研究，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处于今日文化的人，用今日文化的视野，追寻昔日文化的踪迹。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今日的文化，此时此刻的文化是转瞬即逝的，在人们即将把握的一刹那，它即成过去，这就产生了一种辩证意境：我们追寻到的昔日文化的踪迹，往往是今日文化的返照；而我们把握住的今日文化其实仍是一种历史的踪迹。

文化的这种廓然无形、大而化之的特性，不由得使我们的先人警叹：“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的文化弥散于人的一切活动，人是什么？人便是文化，文化便是人；社会是什么？社会便是文化，文化便是社会。这种讲法不管听起来有多少唐突，但本质上便是如此：个人——社会——文化是三位一体的。从个人来说，人之不同于自然的动物，就因为他有文化，按文化的样式行事；而社会无非是有文化的个人的组合，在人和物体之上呈现的“社会”，其实也就是文化之网。这样一来，文化概念如同文化现象一样的廓然无形、大而化之，它弥散于一切关于人、社会和通常意义的文化概念之中，甚至可以说，所有的这些概念都可以归属于或者改造成某种文化概念——物质名称，可以引出“青铜文化”、“核文化”之类；社会科学术语，可以很方便地加上“文化”两字，例如“制度文化”、“法律文化”，地理气候乃至神怪传说，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算作“××文化”的一种。于是，文化概念在无限扩大的过程中，反而消灭了自身：与其他概念相区别的文化概念究竟在哪里呢？这在科学的研究中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讲了半天的“文化”，结果发现只是把原来学科的概念换了一种说法；相反，许许多多不带文化两字的研究，其实却是在严肃地进行着文化研究。

这样，我们不仅要追寻文化的踪迹，而且还要追寻文化概念的踪迹。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文化的踪迹依靠文化概念之界定而得以呈现；而文化概念本身则在文化事实的分析过程中逐步清晰起来。

这就决定了一本关于文化的著作应当如何撰写的方法论。近代文化史先驱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瑞士人雅各布·布克哈特颇有自知之明，他在该书的引言中写道：“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而在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个文化时，作者和读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了。在我们不揣冒昧走上的这个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材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的心情大致也是如此，因此也完全同意他在“引言”中开头的第一句话：

“本书的书名标志它本身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而他用的德文“论文”(Versuch)一词，原意即为“探索”和“试验”。任何文化研究都只是一种对“文化”的“无形之流”的知性加工，一种使不定形之流定形，使多重意义的载体趋近于某一种意义系统而已。

任何文化研究都是一种文化寻踪。

所以，你正在读的这本书正是在“Versuch”一词的双重涵义上写成的：以论文为形式，对文化踪迹的追寻……



I

文化研究：悖论、方法论和多维视野



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悖论”

不管你给“文化”以什么样的定义，“文化”的外延总是无限地扩大，最终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大而无当的概念；反过来，不管我们从如何恢宏的广义文化概念出发来考察文化现象，结果呢，总是用一个极其狭小的文化方面来“偷换”了那比较全面的文化概念——例如以某一家古代思想流派为某民族的“文化”，以某些形容词和名词来指称某种文化特征，或以考古器物和艺术作品来等同某种文化……。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日益繁荣，但这种矛盾的情况却隐蔽地构成了一种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障碍，要解决这个矛盾，固然有待于对文化概念作更科学的鉴定和讨论，但关键所在，不是一两个完整的定义，而是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一种分析文化的更辩证的方法论。本节就从这个想法出发，直接从“文化”和文化研究中所包含的种种矛盾着手，通过分析这些类似“悖论”的问题，来

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文化研究的途径。

1. 悖论之一：“纹花”对“文化”

这一悖论已经明显地包含在文化的用词上了。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人们都在两个极端的意义上，使用“文化”（如英文culture）这个词。一方面，文化表示区别于自然的一切，文化就是人，文化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却指知书识字的文化（“学文化”中的“文化”），这两种用法总是发生混淆，是造成文化研究中概念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各种文化概念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流，从而产生无数外延内涵不同的文化概念。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不另造新词，以便把这两个语义分别用两个词来指称呢？

这里就包含着文化构造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广义的文化看作是人的整个生活样式，而狭义的文化则是象征符号系统——“纹花”；那么，一方面，正是“纹花”记录了广义的“文化”，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人们的生活样式——制度、风俗、礼仪等等，由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品构成的小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大文化的体现，两者若即若离，合二而一；另一方面，“纹花”记录和反映大文化，总是不全面的，这不但因为“纹花”系统本身必然有局限性（如用音乐、美术、文学反映大文化都各有其局限性），而且大文化变为小文化的过程，具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机制。因此，“纹花”只能看作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一个群体人们的生活